


蒋孔阳 朱立元主编
范明生著

西方美学通史
第一卷 **古希腊罗马美学**
XIFANGMEIXUE
TONGSHI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赵南荣

封面设计：王志伟

西方美学通史

第一卷

古希腊罗马美学

范明生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33.25 插页 5 字数 741,000

1999年10月第1版 199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5321-1881-9/I·1516 定价：51.00元

前 言

《西方美学通史》(七卷本)在蒋孔阳先生的主持下,经过我们这个写作群体近十年的共同奋斗和努力,终于全部完稿了。今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让我们以这个集体劳动的成果敬献给亲爱的祖国,作为我们纪念建国五十周年的一份心意,一份薄礼。

回想起九年前,当我们申报的《西方美学通史》(多卷本)刚刚被国家社科基金批准列为“八五”重点科研项目之际,我们在兴奋之余,已感到了肩上的沉重压力和负担。因为这么大规模的西方美学史著,不但国内没有出过,就是西方至今也还没有出过(鲍桑葵的《美学史》、库恩和吉尔伯特的《美学史》等无论在时间跨度上、篇幅上、规模上均不大)。但是既然已立了项,那我们只能背水一战,一定要完成它,而且一定要力争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它。

现在看来,从时间上说,我们基本上是按时完成,还略有提前,因为当初我们申报时就计划跨两个五年计划,争取1999年底全部完成;从数量上看,我们也“超额”了,因为原计划写六卷,每卷平均三四十万字,而现在已扩至七卷,每卷字数少则四十余万,多的达七八十万,平均在六十万字以上;关键是“质”,我们虽

然是尽心尽力了,但限于时间和水平,能否达到较高的水平和质量,还有待于专家与广大读者评判。

就我们自己而言,为提高本书的学术质量,在以下三方面作了较大的努力:

第一,我们尽量多地搜集、发掘、掌握第一手的资料,特别是外文原著的资料,尽量做到全书各卷资料翔实可靠。如第一、第三卷都发掘了一些过去被忽视的美学思想资料;尤其是第二卷中世纪至文艺复兴时期国内已有的译文资料甚少,本卷作者搜集了大量材料,全卷有一半以上的资料为国内第一次译出;第四卷康德美学的全部引文都或据原文重新译过,或是新发现的材料,席勒的不少引文亦均是新译过来的;第五卷俄、德美学中亦有相当部分材料是该卷作者新译过来的。由于掌握了较丰富的第一手材料,我们在勾勒西方美学各个时期的历史发展时,心里比较有底,不至于被某些片断资料所误导。

第二,我们努力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对西方美学史上各个时期的思潮、流派、代表人物的学说、观点尽量作出客观、公正的分析和评价。我们注意从美学史的实际出发,既不简单化地到处套用唯物、唯心的标签并据此作出肯、否的评价,但也不回避美学史上客观存在的心、物之争,对于有关美学家的成就则不以心、物划线,而以其学说的原创性和历史贡献为依据。我们也注意按照唯物史观的原理,不是孤立地叙述美学史的发展,而是将各时期的美学演进放置于那个时代思想文化和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以便能正确勾勒和揭示西方美学发展的基本轨迹和内在规律。

第三,我们比较注意了解、吸收国内外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最新的成果,以充实我们的思想,开阔我们的视野,努力

用当代的意识观照、反思美学历史,以求有新的发现和体会。比如我们以现代眼光研究德国古典美学,就对从康德到黑格尔的美学历史有了一些新的看法;在撰写二十世纪美学史时,我们特别请两位青年学者增写了一编“当代前沿思潮”,主要写八九十年代美学的最新发展,一直写到九十年代后期,几乎与历史同步,以使我们的《通史》更富有新意。

至于我们上述这些努力是否达到了预期目的,还有待读者来检验。

本书由于历史跨度长、内容极为丰富复杂,所以采取由主编统筹、组织、协调,分卷负责的方法,即主编统筹设计、规定总的体例与各卷的历史期限后,每一分卷邀请比较熟悉该卷内容的有关专家执笔撰写,并负主要责任。本书第一卷(古希腊罗马美学)与第三卷(十七、十八世纪美学)由上海社科院哲学所范明生研究员执笔;第二卷(中世纪文艺复兴美学)由上海社科院哲学所陆扬研究员执笔;第四卷(德国古典美学)由黑龙江社科院文学所曹俊峰研究员、复旦大学中文系朱立元教授、华中师大中文系张玉能教授执笔;第五卷(十九世纪美学)由张玉能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张德兴教授、朱立元教授、陆扬研究员执笔;第六、七卷(二十世纪美学)由朱立元、张德兴等同志主要执笔,还有几位青年学者参加了部分章节的编写工作。最后由主编统看全书稿子,在各卷之间作若干调整、协调、润色、统一的工作。由于各卷作者不同,本书只能在历史时代衔接、重要思潮的承续、大的体例和结构布局上保持基本统一,而各卷之间乃至一卷中不同作者所撰部分之间文字语言风格的差异则难以完全统一,只能请读者原谅了。

本书在立项之后,得到各级领导与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市

社科规划办公室将本项目列为“九·五”市社科重点项目,复旦大学也将它列为校“九·五”重点社科项目,给予多方面关心、帮助。在此,我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本书得以顺利出版,我们也不能不衷心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领导,特别要衷心感谢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的理论室主任兼责编赵南荣先生。本书从九年前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起,就得到了南荣及上海文艺出版社领导的支持和关心,很早就列入社里的重点出书计划。本书从拟订大纲、分工起直到每一卷撰写初稿、修改和定稿的全过程,南荣几乎都参与了意见和工作,对全书的体例、编排、设计都提出了宝贵的意见,特别在全书审、编、校的最后阶段,他几乎不分昼夜、全力以赴,以保证本书按期出版。这些年来,我们通过多方面的合作与共事,建立起了相互的信任与友谊。本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作者与编辑、出版者共同努力的结晶。我们希望这种友谊与合作在今后能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主 编

1999年3月

导 论

十年以前,当我们还在酝酿编写一套《西方美学通史》之际,我们对这套书的未来面貌,还只有一个大致的轮廓,而并无清晰的蓝图。而今天,当我们终于把当初的设想变为七卷本的专著时,除了心情的激动和对已经历的甘苦的淡淡回味之外,对西方美学的历史发展,在总体上似乎也有了较之过去更为深切的认识和体会。当然,这只是我们这个写作群体的一些粗浅看法,并不一定正确。因为面对同一历史,人们完全可能也完全可以作出不同的阐释,美学史亦不例外。

一 关于《西方美学通史》的写作宗旨

我们的老祖宗喜欢凡事必先“正名”,这里姑且沿用这一惯例先对本书书名“正”一下“名”。

首先,这是一部美学史著,其学科定位当是美学。但是,在西方,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历史并不长,从1750年鲍姆加登发明“美学”(Ästhetik)一词,把美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至今,亦不过两个半世纪。所以,严格地说,本书并不完全是学科意义上的美学史,而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美学思想史,即在美学学科诞

生后,回过头来把凡符合美学学科范围的哲学家、理论家、批评家的有关思想都看作美学思想,加以归纳梳理,作出历史的描述。正因为是写美学思想史,而非严格学科意义上的美学史,所以其范围相对宽泛一点,既包括历代哲学家思想中涉及美学和艺术的内容,也包括严格说来属于文学艺术理论的思想、观点、学说。这一点跟我国一些中国美学史论著十分相似。当然,本书主要还是按照作为哲学的分支学科之一来理解美学和美学思想的,所以,除了明白无误的美学理论、思想外,一般说来,只有具有某种哲学背景的文艺理论才进入我们叙述和写作的视野。否则美学史就与文论史或批评史完全等同合一了,而这与我们的初衷不合。

其次,这是一部西方美学史,这就有个“西方”的范围如何界定的问题。虽然我们不过沿用了朱光潜先生“西方美学史”的老书名,但在当今世界经济日趋“全球化”的今天,“西方”的含义已有若干变化,如“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把东方的日本也包括了进去,这“西方”显然就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而几乎等于“发达国家”的含义了。又如我们现在讲“西方”,主要讲欧洲、北美,而把地理上同属西半球的中、南美洲排除在外;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又把同属欧洲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排除在“西方”门外,这里“西方”概念又不仅有经济发达之意,还具有意识形态色彩了,其词义与“资本主义世界”相近。这导致美学史写作上一种奇怪现象:苏联美学家撰写西方美学史时常把俄罗斯美学排除在外,而中国美学家写西方美学史时则把沙俄时代的美学纳入其内(如别、车、杜等),却把社会主义的苏联时期的美学排除在外。造成这种对“西方”概念认识和使用上的模糊和混乱自然有复杂的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原因,但却是我们不得

不面对的既成事实。

本书是把“西方”作为一个大范围的地理(域)和文化双重意义的概念来理解和使用的,具体说来,基本上继承了朱光潜和中国其他美学家们的理解和使用的。第一,从地理上说,我们把“西方”看成与亚洲等东方民族和国家相对应的地区来说的,主要指欧美。第二,从文化上说,“西方”主要指发源于古希腊的欧洲文化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西欧文化在北美的传播、延续和发展。中、南美洲等在文化上与西欧不属同一系统因而不在我们的研究范围之内。第三,对于俄罗斯和东欧各国的美学,我们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将十九世纪俄罗斯美学纳入“西方”范围,在第五卷中用了较大的篇幅专门予以介绍;但对前苏联时期的苏联东欧美学则基本不涉及,只写到对本世纪西方美学影响很大的少数美学家与美学学派,如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巴赫金、英伽登等。这在安排上固然不太统一,却也是无奈的选择,一方面沿袭了前辈和已有的西方美学史的写作惯例,另一方面是对苏、东美学缺少资料的搜集与准备,即使想写也心有余而力不足。

还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是一群中国学者眼中的“西方”美学史,此“西方”对于我们来说,不言而喻是属于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大差异的另一系统的文化。我们在写作时既常常感觉到中西文化之间有着某些根本的一致性或共同处,否则两种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沟通根本不可能,中国学者也就根本不可能理解和写作西方美学史了;又时时感觉到中西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乃至鸿沟,中国人与西方人从生活、生存方式到思维、理解方式,直至语言、表达方式,都有着重大的区别,这也导致中西美学在入思和言说等各方面的许多不同特点。我们写作时,比较注重分析、揭示“西方”美学不同于中国美学思想的特殊性。当然,这

一半是由于我们作为中国学者的文化基因所致,并非纯然特意为之。

再次,这是一部西方美学通史。所谓通史,自然既不同于专史或专题史(如美论史、美感论史、艺术哲学史、审美观史等等),也不同于断代史(如古希腊罗马美学史、中世纪美学史、文艺复兴美学史等等),而是贯通古今的历史。具体来说,就是把从古希腊至二十世纪末的今天,时间跨度达二千六百年之久的、美学思想演变的历史,贯通起来写,努力揭示其发展的轨迹和演进的规律。

据此,我们写作时努力注意两点。一是写史一定要有历史观念。不能把各个时代的单个美学家及其代表作、美学思想简单地按年代先后叙述、编排起来,而忽视其内在的历史联系。在我们看来编年史不是真正的历史著述。因此,我们每一卷都注意发现和概述各个时代重要美学家、美学思想之间的历史承续、沿革、论争、否定、创新等错综复杂的关系,尽可能清晰地勾勒出各个时代美学思想的发展脉络和历史轨迹。至于这种勾勒和描述是否科学,是否准确地揭示了各时代美学思想演进的历史真相,则有待于读者的评判了。至少我们主观上是尽了努力的。二是写通史一定要真正“通”起来,就是说一定要把古今贯通起来写。具体来说,虽然我们各卷是由不同作者分工写作的,但分工并不分家,人人都要有全局、整体观念,都要把自己所写的部分放在二千六百年美学思想的漫长历史中来观察、思考,而不能与整个历史割断。这里涉及的方面很多,既有各时代、各卷之间的前后衔接(如古希腊罗马美学与中世纪美学间的承续、连接),又有前代美学家对后代美学家的影响(如柏拉图对新柏拉图主义乃至对黑格尔、叔本华的影响)和后世美学家对先辈的继承或批判的

分析,还有各个时代之间或同时代美学思想、思潮、流派之间的比较(如罗马古典主义与十七世纪法国新古典主义之间的异同、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的比较等),如此等等,每卷作者都要考虑到古今贯通这一层,都要在西方美学“通史”中把握和叙述自己分工所写的那一部分内容。

此外,本书虽然是美学史,但因为美学在西方既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又与艺术创造实践和审美趣味、风尚息息相关,还同文学艺术理论密切联系,所以美学史同整个思想文化史紧密相连、不可分割。更确切地说,西方美学史在一定意义上是整个西方文化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不可能离开整个西方文化史孤立地理解、说明西方美学史;同样,我们也无法设想,如果排除了西方美学史,还怎么可能理解、阐释整个西方文化史。因此,我们写作时力图一方面在文化史的大格局中把握美学史,而不是孤立地就美学谈美学,把美学史从文化史中游离出来;另一方面又由美学史切入,透过美学史的叙述而展示文化史的风貌。一句话,着眼于文化史而落脚于美学史。

那末,本书是如何勾勒西方美学演进的历史轨迹呢?我们认为,对整个西方美学的历史发展,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思路、在不同的层面上加以概括和描述。

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基本上是按历史上大时代的划分来组织素材的,它分为“古希腊罗马时期到文艺复兴”、“十七八世纪和启蒙运动”、“十八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三大部分。但这只是表层结构,其深层结构是三条重要线索。第一条也是最根本的线索在朱先生看来是,“美学发展史在大体轮廓上归根到底,总是跟着社会史走的。就欧洲来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

本主义社会这三大阶段中的美学观点各有明显的区别,都带着社会经济基础的烙印。这是必须首先牢牢掌握的一条线索”^①。这一条是从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基本原理推导出来的,即美学史跟着社会史走、社会发展史最终决定美学史。这自然是一条颠扑不破的马克思主义真理,但在我们看来,这一条线索不但对美学,而且对一切思想意识、精神文化都适用,因此对美学史的写作来说,似显得过于宽泛、过于一般化。

也许朱先生意识到了这一点,又提出与美学较为接近的另两条对立的线索来“统”整个西方美学史,这就是以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大哲学家、美学家为代表的“两种性质不同的对立线索”:

……他们所代表的一方面是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
对立线索,另一方面是浪漫主义与现实意义的对立线索。这两种对立线索又是错综复杂的:我们不能庸俗化地在唯心主义与浪漫主义以及唯物主义与现实意义之间画出等号,尽管在历史上消极的浪漫主义曾和唯心主义结合在一起,而现实主义大半曾和唯物主义结合在一起。^②

但是,在二十世纪末的今天看来,朱先生所概括的这两条互相对立的主导线索,似乎并不十分切合西方美学发展的实际;把一部西方美学史概括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对立斗争的历史,进而使肯定的价值评判主要向唯物主义

^{①②} 《西方美学史·序论》,上卷第6、6—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

和现实主义方面倾斜(这一价值标准暗含在两条对立线索的概括之中),显然是过于简单化且有失公允的。当然,这应当看作中国那个特定时代过于政治化的社会环境和思想氛围在朱先生思想中留下的烙印与痕迹。况且,在具体阐述西方美学史上的许多美学家的美学思想时,朱先生也并未处处紧扣这两条主线,倒是时常有意无意地偏离这两条主线而作出深刻精辟的论述。

本书分卷基本上承袭了朱先生的《西方美学史》,第一卷为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美学,第二卷为中世纪至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学,第三卷为十七、十八世纪美学,第四卷为德国古典美学,第五卷为十九世纪美学,第六、七两卷为二十世纪美学。如把这一分期(分卷)也看成本书的表层结构的话,那末,本书的深层结构,大致上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两条主线。三个阶段是:本体论阶段,认识论阶段和语言学阶段;两条主线在特定意义上为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本书基本上是按此思路展开论述的。下面试分述之。

二 西方美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把西方美学史分为本体论、认识论、语言学三个阶段的基本原则是跟着哲学史走。原因很简单,这既符合西方美学发展的实际,又符合西方视美学为哲学的一部分或分支学科的主导观念。西方哲学从发端起,就孕育、包容着美学思想和观念,古希腊各派哲学家以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大家的美学思想都是从其哲学思想中派生、推演出来的,都是其哲学思想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缺少了其美学思想,其哲学思想就残缺不全,无法理解;同样,离开了其哲学背景,其美学思想也就变得突兀孤立,难以阐

释。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本世纪。本世纪美学虽然出现了诸多剧变和“转向”，从古典主义美学形态走出，经过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但美学与哲学的密切关系仍然未变，有时美学甚至直接就是哲学，而哲学有时又以美学形态来表达。诚然，一些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不但主张消解美学，也主张消解哲学，他们的入思和言说方式也确实与传统哲学、美学大不相同，但细究其入思路径，其消解哲学、美学的主张，仍未能最终摆脱西方历来美学与哲学一体化的传统。如法国思想家利奥塔的后现代哲学的核心是“让我们向统一的总体性(totality)开战”^①，即向传统哲学追求的普遍性、统一性、整体性和极权开战，以实现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颠覆。沿此哲学思路，利奥塔对西方传统文化、主要是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降的理性主义文化进行解构，他认为，理性文化的实质就是崇拜话语(词语)，也就是对欲望的僵化，欲望于是只有在艺术和审美的感性形象(figure)中方能得到健康的实现。在他看来，只有颠覆理性主义话语文化，用艺术和形象来拯救感性欲望，才有可能根本上拯救西方文化。对此，有的西方学者精辟地概括道：“利奥塔希望使形象进入和塑造话语”，“其目的是用形象的语汇来打破抽象的理论话语，用采取越轨的文学策略的新语汇来摧毁霸权话语”^②。由此可见，利奥塔的后现代主义美学思想仍与其颠覆传统的后现代哲学一脉相承，血肉相连。

既然西方美学的历史发展基本上是跟着西方哲学的历史发

① 利奥塔：《后现代状况》，第211页，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译文据原文有所改动。

② 贝斯特、凯尔纳：《后现代理论》，第151—152页，麦克米伦1991年。

展走的,所以,国内外哲学界不少人把西方哲学分为本体论、认识论和语言学三个阶段的观点,也大体适用于西方美学史。

下面,我们试分别对这三个阶段作一概述。

第一阶段,本体论阶段,从古希腊罗马至十六世纪。

所谓本体论(ontology)是指(西方)哲学中关于“是”或“存在”(being)的学说,即“是”论或“存在”论,它是用概念的逻辑推论建构起来的、追求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纯粹原理。一定的本体论可包含和推演出相应的认识论、方法论等。古希腊哲学,总体上属于本体论哲学;古希腊美学,同样可归结为本体论美学。

希腊哲学发展的全过程都贯穿着对“是”或“存在”问题的关注和探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古希腊哲学中心就是“是”论或“存在”论,也即本体论。在早期,如米利都学派等提出“始基”概念来探讨作为某种可感性直观的物质形态的“存在”。巴门尼德在哲学史上首次提出“是”或“存在”范畴,并对“存在”(“是”)与非存在(“非是”)作了严格区别,肯定了“存在者存在,它不可能不存在”的探寻真理之路,而否定了“存在者不存在,非存在必然存在”的谬误之路。关于巴门尼德的“存在”(“是”)的含义,有的学者提出如下看法:

我们可以把巴门尼德的“存在”的本来意义概括如下:存在是物质和意识(包括事物的数量、关系、性质等属性)的总和。巴门尼德把这样的“存在”概念转到思维领域,作为逻辑思维的对象,成为一个由思想把握的东西,所以它是抽象掉各种特殊性后所留下的最一般的共性。……不过,巴门尼德还没有完全明确意识到个别和一般,具体存在和抽象存在的区别,而是作为一个物理学家那样来设想

“存在”，把它比作球，有“界限”，有“边界”。^①

我们基本同意这一看法，并认为这就是巴门尼德存在论的基本内容。巴门尼德上述关于存在问题的主张，确立了希腊哲学中“存在”论即本体论的中心地位，后来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则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这一中心地位。

柏拉图哲学的基础是理念论，理念论关注的中心是一般与个别问题。他认为，理念是与个别相对立的一般、与殊相（特殊性）相对立的共相（普遍性），也就是一般“存在”。他把这种一般、普遍的理念设定为客观、绝对的存在，它超越时空，因而是不同于个别、特殊的感性存在。其目的是探寻感性存在的一般原因和根据。这样，理念就从作为实在事物的共相变为与实在事物相分离的一般存在。顺理成章的推论就是，柏拉图从理念和感性两个世界的分离出发，构建起由理念的先验存在到个体事物分有理念的感性存在这样两个等级的存在结构。这是对巴门尼德存在论的重大推进。

亚里士多德一方面沿着柏拉图的思路，继续寻求感性存在的一般原因和根据——一般存在，另一方面则批判柏拉图的理念论对一般与特殊的割裂，认为一般存在同感性存在不可能分离，而是就存在于感性存在之中。于是他把焦点集中到一般存在的存在方式问题上，也就是集中到作为形而上学即第一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上。在《形而上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指出，形而上学是研究“存在之所以为存在”以及“存在由于本性而应具的属性”的学问，它的目的是“寻取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因为“第

^① 庞学铨：《存在范畴探源》，第55—56页，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

一原因也应当求之于存在之所以为存在”^①。显然,亚里士多德心目中,这种“存在”或“是”不是具体、个别、特殊的存在物或存在物之总和,而是从个别存在物中抽象、概括出来的一般存在,或“存在之存在”,即存在本身。存在是对世界的总体的最一般概括。亚里士多德又在《范畴篇》中对“存在”或“是”用十个范畴加以具体规定,其中第一个亦是最核心的范畴为“本体”。因此亚里士多德也把形而上学或哲学存在论称为“本体之学”,其目的是“捉摸本体的原理与原因”^②。亚里士多德还指出,本体为“原始存在”,它具有三个“原始”意义或特性:(1)“于定义为始”,在给存在物的属性下定义时须先说出其本体的定义;(2)“于认识之序次为始”,要完全认识一事物,须先问该物是什么,即先认识其本体;(3)“于时间为始”,就逻辑范畴而言,时间上先有本体,后有依赖于它的其他范畴。^③可见,在亚里士多德存在论中,本体是独立的最高的核心范畴,其他所有范畴都由它派生、为它决定,只充当它的宾词或属性。由本体与属性的区分,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把一般存在即作为存在的存在分为本体存在与属性存在两种基本的存在样式,从而明确了形而上学的具体研究对象与内容。同时,亚里士多德还对存在的意义作了多方面多层次的具体分析,纠正了柏拉图对一般与个别的割裂,既指出一般存在不能脱离个别事物的感性存在而独立存在,又肯定了人可以借助逻辑、概念、范畴从个别事物的感性存在中抽象出一般存在来。这就使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存在

①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1003a21—30,参见吴寿彭中译本第56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

②③ 《形而上学》,第57、125—126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